

# 樊纲、张维迎改革对话录

□ 马 克

## 改革：任重道远

樊纲：中国的改革改的不仅仅是 1949 年之后的 30 年里形成的东西，那是前苏联、东欧国家同样存在的转轨问题和体制问题。中国的改革还有一个重要的对象，那就是成百年甚至上千年里形成的东西——民主法治传统稀缺、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这是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共同难题。

转轨问题和发展问题交织在一起，使中国的改革异常艰难。我们这些理论工作者所做的一切事情，写文章、做报告、出书，都是为了缩短这个过程，为了政府能够更加理性、科学，企业家和老百姓头脑更加清楚、思想更加解放。

不做这些事情，中国要建成一个完整规范的市场经济，恐怕需要 100 年，做了这些事情、做到最好，也还得 30 年甚至 50 年。我们这代人很可能看不到那一天了，这就是客观规律。但改革不是为了一代人，而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张维迎：30 年计划经济，时间虽然不像前苏联那么长，但 30 年交织了几代人，形成了从最基本的产权制度到文化道德观等一整套体系。借用王蒙的话，是一锅“坚硬的

稀粥”。

为什么要建立计划体制，是为了实现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赶超。当时的人们相信以国家出面，用政府主导的形式，把所有的资源，甚至人的思想都集中起来，能够最快地实现工业化变革。

实践证明，它破坏了对个人的激励原则。当民众没有创业的积极性、社会因为缺乏竞争而死气沉沉时，政府由上而下推动工业化就无法持续。事实上，计划体制不但没有完成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反而为转型带来了更多的障碍。

回顾最近二十多年走过的路，可以说改革的方向一直在探索之中。改革初期我们的想法只是在计划经济框架内引入一点市场条件，所有制问题就更没有提出，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看法是咱们的体制没问题，只不过让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给耽误了。只要把能人放到计委，再引入计算机设备分析投入产出，计划经济就能运转。回头看去，当时最激进的改革派也没能把改革方向看得很清楚。

## 思想解放是改革的先声

樊纲：建立市场经济的概念到了九十年代初才有，但直到现在要

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市场经济，认识仍未统一，因为传统观念仍然束缚着人们的手脚。我们可以看到，资源配置还在通过政府的优惠政策向某些企业倾斜，产权改革在很多地方还是步履维艰，明明企业再不卖掉就一钱不值了，但由于一些人坚持，大家不敢轻举妄动。

张维迎 对企业家而言 如果旧观念仍居主导地位，个人财产的合法性就仍然成问题，对个人产权的保护就仍然成问题。在这种预期下，人们的行为就会扭曲，就容易短期化，就会考虑用金钱换取权力来保证安全。

樊纲：1978年以来中国经历了三次思想解放，第一次冲破了“两个凡是”第二次突破了“姓社姓资”，1997年“十五大”前后开始了第三次思想解放。这次思想解放可能是最为关键的，它仍在进行中。1997年以来民营经济的发展环境改善了不少，宪法也作了一些修改，但是思想还远没有彻底解放，这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的改革。

张维迎：我们自己给自己套了太多的枷锁，并且对它们顶礼膜拜。好在改革以来每隔几年枷锁就要被砍掉几条，人们的思想随之解放一次。许多东西，我们觉得是创新，是理论上的飞跃，在国外学者看来都是常识。

## 改革的大方向不可逆转

樊纲 二十多年来中国一直在

探索，不是探索怎么走，而是往哪儿走。方向不明确是中国改革的一大问题或者说一大特点。

一方面，方向不明确总比明确一个错误的方向好；另一方面，这么多年的摸索，死胡同一个一个地走完，南墙一堵一堵地撞遍后，改革正在逐步逐步地明确起来，比如产权改革，比如发展民营经济。市场经济的原则是一致的，不可能人为创造出另外一套东西。

我是相信经济规律的，只要经济规律起作用，中国就会朝着正确的方向走。10年前，经济学家们关于产权改革的讨论根本没有人听，但是现在我们正在朝这个方向走，与此同时，经济没有死、社会也没有乱嘛！

没有谁能够左右改革的方向，改革实际上是一个自动的过程。最初是邓小平打破坚冰使变革得以开始，但越往后越是下面推着上面走，实践推着政策走。

对未来 我一直比较乐观 因为我相信见了黄河、撞了南墙之后，我们的政策会做出调整。只要大家不想中国垮掉、真心地希望国富民强，中国就会按经济规律办事，虽然时间可能会比较长，成本可能比较高。

张维迎：中国未来的走势已经比较明朗了，大趋势是不可逆转的，而且速度正在加快。我认为中国陷入动荡或者像印度那样的制度性腐败的可能性不大。因为非理性的行为往往发生在缺少约束的封闭社

会，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就像企业与企业一样，国与国之间也面临着竞争。国家和企业一样，面对竞争压力，要想生存就得改进效率，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激发民众积极性的体制。

竞争是改革的动力，它会使中国或主动或被动地走入正确的轨道。没有竞争，无效率的体制就会一直锁定下去。

其实观念问题不单是你信什么不信什么，可怕的是，观念可以变成斗争的工具。最简单的例子，你说这个企业应当卖掉，虽然我知道你说得对，但我依然会借此把你赶下台。所以，一个无效制度的最可怕之处不在这一制度本身，而是它会创造出维护这一制度的人。这样就使这个制度改起来非常难。

### 没有份额的变化就 不是真正的改革

樊纲 历来如此 不仅中国。这不能只用经济学，而要用政治经济学来解释。改革难就难在有人的处境会因此而变坏。尽管全社会总的利益增加后我们可以给那些受损失者补偿，使他们的利益从绝对量上不致下降。但在相对量上，权力失去了、地位失去了、相对的高薪失去了而在一些人看来 维护自己的利益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你可以改革人们的思想认识，但你改变不了既成的利益格局。官员就是不愿失去权力，国企职工就是不愿意下岗。

利益格局决定人们的行为模式。

张维迎：旧的既得利益是确定的，变革带来的潜在利益可能非常大，但是它的受益者是不确定的。在这种情况下，维护旧利益格局的力量就要比追求新体制的力量强。因此，改革就一定要对既得利益进行“赎买”。

樊纲：还有一种情况是确定的，就是一部分人可能会相对较少地从新体制受益。比如岁数较大的人，已经退休的人，尤其是国有企业的职工。

事实上，经过 20 年的改革，由于整个社会的生活水平大大地提高了，50 岁以上的人生活水平比起过去仍然提高了一大截。而年轻人是认同改革、认同收入差距、认同市场的，因为改革给他们带来了更多的机会和更光明的前途。这也正是中国稳定的原因之一。

张维迎 这里有两个概念，一个是绝对水平，一个是相对水平。在效用函数中，我的效用不仅来源于我的收入，还来源于你的收入。

即使整体而言蛋糕变大了，每个人分得的那一块也变大了，但分配比例的变化改变了人们的社会地位。打个比方，原来一共有 100 块钱，我拿 90，你拿 10 块，现在有 1000 块钱，我拿 400，你拿 600，对我来说，收入是增加了几倍，但在感觉上会觉得还不如原来拿 90。

樊纲：所以不可能对既得利益者做到完全的补偿，相对水平必然

要下降。体制改革就是为了把收入分配办法改变过来。

在传统体制下，只要是国有的，就能享受到优惠和特权。国企职工干多干少、干好干坏都是铁饭碗，厂长经理们无论企业盈亏都可以升迁，市场化改革就是要改变这种利益格局，变成按效率来配置资源、分配收入、能者多得、勤者多得。一切在过去不劳而得、少劳多得的人，一切自身效率低下、靠体制保护维生的企业和部门，都将是这场变革的受损者。如果还是我拿 900 你拿 100，那么改革就还没有完成。

张维迎：没有份额的变化就不是真正的改革。补偿是另一回事，补偿实际上是一个交易的过程。如果补偿的结果是你的状况比以前变得更坏，那你肯定不会接受，这是交易成立的前提。

现在，我们的社会资源被大量浪费了，如果把资源交还民间，就会创造出更多财富。我们可以从更多的财富中拿出一部分，来对既得利益者进行补偿，以换取他们不至过多地反对把社会资源交出来。这就好像两口子离婚，一方不同意，另一方提出房子可以留给你，每月再给你若干生活费，这样婚就可以离成了。也就是说，通过改革改变了他们实现利益的方法，这对整个社会都是有益的。麻烦在于补偿标准怎么定，有权力的人讨价还价的能力强，此外还可以通过寻租自我补偿，普通职工就缺乏谈判能力，只能由上

面来定，因此交易的公平性就成了问题。

樊纲：这就是我刚才没讲完的那层道理。我们这个制度所能做到的补偿，就是使你的绝对收入不下降。改革的难点，就是它不能使人人受益，这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两回事。生活水平大家都提高，即使下岗工人，生活水平也比 20 年前好。但这是绝对收入，相对收入，他们肯定大大下降了。因此，进行补偿可以减小改革阻力，但是无法消除阻力，因为你不可能在相对量上也作出补偿。

### 大幅度削减政府管理 经济的权力

张维迎 权力的资本化、货币化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旧体制下，政府官员的社会地位是最高的。改革就是把这个金字塔型的单一利益结构变成利益主体多元化，选择多元化的多元利益结构。虽然我不当官，只要我富有，你能享受到的我都可以拥有。

但在现实中，一些有权的人总能通过操纵改革进程补偿自己，权力货币化后，他们获得的东西甚至比以前更多了。比如官商现象，官员寻租设租现象。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超出了经济学家的能力范畴了。

你原来获得的利益有没有合法性，这一点暂且不论，我们讲改革，就一定要尊重既得利益。剧烈

的变革，结果往往不如意。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说过，历史没有飞跃，单是改变人们的预期就需要很长时间。

樊纲 在现阶段 我们看到的官商又挣钱、又舍不得权 利用权力经商、利用经商谋权 挣钱归自己、亏损给国家。这就是典型的转轨期腐败。经济学家张五常多次提醒说，中国不能掉进“印度陷阱”所谓“印度陷阱”就是旧体制不变的同时又利用新体制牟利。改革理论越是不彻底 越是有观念上的障碍 越容易形成制度化的腐败。因此本次思想解放是最基本的，先把产权关系理顺。

张维迎：如果产权改革能够完成，就不用担心制度化腐败了。否则，像印度那样，私人可以办企业，但举手投足都要政府官员批准，东西是你的，干什么得听我的，这不等于你有了财产权。

问题是这种权力本来就不该他所有。首先要从理论上否定审批制的合法性。创业是人们天生的权利，就像说话一样。你能想象每说一句话都要经人审批的情形吗？我多次讲到审批问题，如果把审批统统废除了，腐败至少减少 50%，GDP 至少增长 30%。

现在政府改革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在我看来 政府改革 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大幅度削减政府管理经济的权力，还民众以创业自由。政府的职能就是保护产权、维护法律

的严肃性 越过这一点 政府想有所作为，副作用就很难避免。

樊纲 政府行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现在已经取代国企改革成为社会矛盾的一个焦点。这方面的关系处理不当，就会成为社会稳定最大的破坏因素，这一点是必须提出警告的。政府不在大小，而在于干什么。如果今后还是把精力放在抓经济管企业上，那一定会导致低效，导致政府机构越来越庞大、苛捐杂税越来越多，最终激化社会矛盾。

1993 年我写过一篇文章《市场中的政府》这篇文章已经发表了七八年，但是我仍然愿意在这里重复其中的主要观点，市场经济中政府应当做的事情是 提供法治、产权保护、市场秩序和基础设施。

樊纲 1953 年生于北京，曾先后在河北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哈佛大学等学校求学深造，1988 年获得博士学位。现任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博士在宏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领域有深入的研究。

张维迎 1959 年生于陕西吴堡，曾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James Mirrlees，1994 年获牛津大学博士学位。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张维迎博士在企业理论等领域有独到的见解。

（摘自《南方周 》）

# 一场有重要意义的论争

□张剑荆

由吴敬琏教授的观点引发的股市论争，随着五位经济学家的联手反击而达到了高潮。在详细阅读了吴教授的相关言论及五位经济学家的反驳后，笔者产生了一种感觉：要认真讨论一个问题何其难也！尤其是在当事者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媒体把意见诉诸公众的情况下，“对话”往往沦为“作秀”。只要比较一下对立双方的言论就能看出，五位知名学者对吴先生论题的误解是明显的。他们把后者的一系列言论，概括为“要不要取消股票市场的问题”而实际上只需读一遍吴先生的文章便清楚，他的意思实际上是“股票市场要不要改革的问题”。迄今为止，我也没有读到一篇建议取消股市的文章。由于存在着这个严重误解，他们的所谓反驳不过是自说自话而已，有点高射炮打蚊子的味道。当然，正如人们常说的，一百位经济学家就会有一百种以上的观点，分歧是常态。没有谁的意见是不能批评的。

批评吴敬琏先生的经济学家显然认为自己是站在“现代”市场经济推进者的立场上的，他们把自己视作中国股市的“保护神”和“慈父”，是“正确的”市场经济的推进者，一位批评者概括说：这场争论“涉及到

我们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市场经济体制问题”。根据这样的自我定位，有人对吴敬琏总是对处于现代市场经济核心地位的资本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一直采取“泼冷水式的冷漠关爱”表示难以理解。吴敬琏先生素有“吴市场”之称，而今日竟被冠上“反市场”的帽子，确实是值得关注的。

那么，认为吴敬琏反市场的人是怎么理解市场经济的呢？他们的“正确的”市场经济是什么样的呢？他们并没有给出一个定义，但是从他们对股票市场的论说上，可以看出一点影子，有人说“股市发展的历史就是投资者钻空子、政府和立法单位堵空子这样一个博弈的过程”。这个论点描述的是市场制度的形成过程，从经济学的一般原则来说，这个论点不能认为是错误的。但是，他们从这个原则中引申出来的结论，则是成问题的，他们说，制度形成的这种特点必然使这个过程“带来不规范，又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因此，吴敬琏先生不应当采取“冷漠的关爱”而应当“采取关怀爱护的态度”。他们的意见是，不能把规范问题提得太突出。

这种看起来“宽容”的态度颇能打动人心，但却是一个似是而非的

观点。市场固然要在诸多主体的博弈中形成完善，但是一个正常的而不是畸形的市场的形成，需要各个主体“权力”（这里对权力的定义只是指资源禀赋状况）的大致均衡。只有在这个前提下，博弈才能取得大致公正的结果。而且，即使有了这个前提，公正的、正常的结果也不是自动、自然地浮现出来的，还需要某种“矫正的正义”。稍微对我国股市有所了解的人都清楚，目前的市场是一个权力落差很大的市场。即使那些都在钻空子的投资者，其权力也有着巨大的落差，有些投资者拥有巨大的权力，甚至可以制订规则，而有的投资者则只能被动地接受大户们制订的规则，徒唤奈何。比如一再曝光的上市公司编造虚假信息问题。红光公司靠编造虚假信息上市，上市后继续做假账，还有大庆联谊、蓝田、郑百文等都大规模地制作假账。这种邪恶的行为，就是权力落差过大带来的，普通投资者只是在丑闻曝光后，才了解到事实真相。由于尚存在着计划经济的残余，政府行为不规范，本来是“堵空子”的博弈参加者，有时却成为钻空子者的俘虏，于是存在着又当裁判又踢球的现象。在这个不规范的市场中，公司从上市开始就是一场巨大的盛宴，已经曝光的一些腐败案件，不少就与公司上市有关。至于上市后的幕后交易、编制虚假信息、黑庄操纵等更是屡屡见诸报端。

在此情况下，希望自然地、自动

地出现一个正常的现代市场，就显得幼稚了。如果不是不断地矫正市场主体的行为，那么最终出现的市场就可能是一个畸形的市场，与我们希望出现的市场经济南辕北辙。根据我的理解，吴敬琏先生对股市的评论，正是基于此。

作为经济学家的吴敬琏先生的评论引来如此巨大的反应让很多人感到吃惊。分析这一现象，我感到，我国的市场经济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仅仅靠批评吴敬琏的经济学家所说的“钻空子”者之间的博弈已经不够了，现在需要独立的、清醒的声音。

一位批评吴敬琏的经济学家斥责吴先生没有区分清楚“专家精神和平民意识”，没有区分清楚“经济学家与普通人的差别”，指责吴教授过分地为老百姓说话。如果我们考虑到上面所谈到的权力落差，那么可以说，为老百姓说话，强化平民的声音，恰恰正是我国市场经济走向高级阶段所需要的，只有增加他们在博弈中的分量，提升他们在博弈中的权重，我们的市场经济才有可能走向正常，也就是吴教授多次描述的“有社会公正的市场经济”，而不是成为畸形的。我想，大概不会有人把吴教授当作“钻空子者”吧。按照那位经济学家的看法，吴教授自己选择了经济学家精神、专家理性的对立面。我们不去争论什么是经济学家精神，但是那位经济学家的区分倒是值得讨论，经济学家站

到平民立场上难道有什么错吗？

时代已经发展了，没有人再要求所有经济学家都以“全人类”、“中国”、“人民”的名义说话。经济学家分化为不同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已经被认为是正常的了。经济学家可以为大款服务，也可以为政府服务，在他们中间分出高下是没有意义的。但是，作为经济学家，其职业要求他必须诚实，他在发表意见时，应当诚实地说出他的位置，而不是用“全体人”的名义把自己包装起来实际上只是某个集团的说客，这种不诚实与股票市场上编造虚假信息一样，都是欺诈。吴教授明确了自己的位置，说明他是诚实的。至于说经济学家的专家精神，我认为，在价值的天平上，一个经济学家，最关键的精神倒是“常识理性”。常识理性的发展，往往是在结束了一天的喧嚣在阒静无声的晚上，放弃了专家的精神，面对自己的良心时，比如在股市问题上，你确实与黑幕无关也不知道有严重的幕后操纵行为么？

给吴市场冠上一副“反市场”的帽子是经济学家的理性精神在指引我们的经济学家这样做的吗？对吴教授不抱偏见的人，都应当看到，吴教授仍然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勇敢旗手。他的全部努力都是为了建立一个现代市场经济，而不是畸形的市场经济。早在几年前，他就分析过我国下一步改革的目标和面临的阻力。他认为，在未来的改革中，初期改革的受益者、借改革发了财的人

们将成为反对进一步改革的“第三种社会力量”。他说：“改革越是深入，那种由于行政特权干预和经济秩序混乱而造成的发财机会越是面临消失的危险，他们就越是感觉到自己正在成为改革的对象。于是，这些人的保守的一面就会越来越突出。他们往往以各种各样的借口（包括“保护前期改革”的借口）阻碍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甚至会在改革中塞进自己的私货，创造新的‘寻租’的可能。……一方面他们的活动使改革走入迷途，妨碍健全的市场制度的建立；另一方面，又使不明真相的群众误以为在当前的原始市场经济中出现的种种有悖社会正义的丑恶现象都是改革的产物，对改革产生抵触思想……（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战略与实施》）。

吴教授敏锐地预见到，相当一部分改革前期的受益者将成为要求“维持现状”、少讲规范和改革的社会力量，吴市场继续前进了，而他的有些同路人还停留在原地，他同他们的“博弈”就难免了。

吴教授也对理论论争的利益背景看得很清楚，他说：“利益关系毕竟是思想认识的基础。即使是理论上的争论，除了认识上的分歧所导致之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利益关系所决定的。例如以下的一些理论分歧：通货膨胀究竟是有益无害，还是危害甚大；……以及证券市场、期货市场究竟应先发展、后规范，还是在规范的条件发展等等（吴敬

# 外来兼并与『民族斗争』

□何仑

当 80 年代美国人惊呼日本在“购买美国”、“购买美国的象征”——纽约洛克菲勒中心、“购买美国的灵魂”——哥伦比亚娱乐公司时，太平洋彼岸的我们很有些隔岸观火的兴致，甚至感觉这虽是日本人干的，但我们也出了口恶气——傲慢自大的美国人也有这种时候。然而时过境迁，《纽约时报》专栏作家鲍·克拉戈曼发现，如今美国公众对外资大肆并购美国公司的“态度相当平静”；他认为其主要原因是由于美国人的“一种自鸣得意——美国现在是如此丰满，以至于美国人感到实际上是在并购他们”。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中国，我们中的不少人还在类似 80 年代美国人对外来兼并的恐惧与“恶劣反应”（鲍·克拉戈曼语）中挣扎，特别是在预期我国入世后市场准入的限制将大大减少，被我们一些人称之为“狼”和“敌”（“与狼共舞”“敌强我弱”成了与外资有关的时髦词汇）的外国资本将大量涌入“敏感”、“重要”领域的时候。

就目前来看，虽然由于限制，还没有出现过一起规模较大的外资兼并中国企业的案例（港台地区除外），但仅仅是外商在中国建立的独资或合资企业所引起的一些反应就够严重的了。“产业安全危机”、“赚中国人的钱”等是一段时期以来我国媒体上最富于刺激性的标题；“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力”、“享受中国市场高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保护”、“占领中国市场”等这类最正常的外国投资策略和战略均被升华为“民族斗争”。一些作者不无忧虑地一再忠告（实际上是在重复亚当·斯密以来所有经济学家都认可的观点，以及所有一般的投资者从不否认的事实），不要以为外商是慈善家，他们是为了赚取或攫取利润。显然，忠告者们并非无知到想以此来暗示中国商人是慈善家，而是要强调一个“外”字和所谓“内外有别”暗示作为“狼”和“敌”的外商不配享受与我们同等的国民待遇。

璩：《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战略与实施》。我觉得，像吴教授这样明确地把理论争论同利益关系联系起来的经济学家，并不是很多见的，吴教授有足够的诚实暴露自己的“利益关系”。

诚如批评吴教授的那些经济学

家所说，目前的这场论战的意义不只是一要不要规范股市的问题，而是再次提出了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市场经济体制的问题。真理越辩越明，公道自在人心。

（摘自《中国经济时报》）

我们似乎很善于从企业的经济行为中嗅出“民族斗争”的味道。80年代，我们笑眼旁观美国人对日本的愤怒与无奈，现在我们又说美国太狡猾——当初把资产不良的公司搁在日本人肩上，换钱来进行自身的结构调整，之后又把日本人甩在后头，还把当初让日本人保管的东西（包括洛克菲勒中心）也拿了回来。问题是，我们就不能像美国人那样把我们一些资产不良的民族工业象征“让外商去扛着，换钱来进行自身的结构调整吗？恐怕不能，或许因为我们历来是谦谦君子，不屑于这类损人利己的勾当。

当然，在我们的公司兼并了外国的钢厂、铁矿等的时候，我们自然不提“民族斗争”了。如果当地人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我们或许会苦口婆心地向他们宣讲全球化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以及外来投资对当地的好处。

鲍·克拉戈曼毫不客气地指出，80年代，美国人对外资“反应恶劣”；是一种浅薄愚蠢的反应”而眼下这种“说不定谁兼并谁呢”的情绪反映了“十足的陈旧世风——美国人的傲慢自大”。他寄希望于美国人的理性与成熟。

我们该如何从自卑与傲慢纠缠不休的心态中解脱，而将兴趣集中在真正重要的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上呢？由于我们民族辉煌的历史及后来的耻辱（鲍·克拉戈曼以“数世纪前中国人被野蛮人征服”时的心

态作为例子，来分析美国人），由于我们目前的落后状态及体制和价值观念转轨的艰难复杂，我们的解脱历程恐怕更为艰辛。但无论如何，我们需要解脱，而解脱只有靠理性与成熟。否则，我们大不了也只能像美国人那样，在“虚弱”时只想着自己被“出卖”；“反应恶劣”而在有“实力”时趋于那种“实际上是我们并购他们”的假想，毕竟我们民族历来有着对外来事物及人的无与伦比的同化能力；或者，当“虚弱”与“实力”并存之时，两种反应兼而有之，徘徊不定。

面对外来兼并，人们难免会有一种本能的抵抗。谁不想作强者、当老大呢？问题应当是人们能在多大程度上超越或在不伤害别人的情况下有效地利用这种本能，来加速自身的发展。美国人对外来兼并的“反应恶劣”相对并不那么强烈，因为他们毕竟从小就受到市场竞争的教育及环境的熏陶，此外，由于美国是个移民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某种天然的全球化倾向，否则，美国政府即便是铁杆的市场经济和全球化迷，也不敢违背强烈的民意，在80年代面对日本“购买美国”而不采取限制措施（就算是诡计吧）。结果，美国没有虚弱下去，倒是对市场准入限制过多的日本虚弱了。这或许是经验，也是教训，似乎是在告诫我们：如果由于种种历史与现实及人类本能的原因，我们不得不对外资“反应恶劣”的话，那么，其强烈程

# 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许志功 姜鲁鸣

我们所说的当代资本主义，是指以二战结束为起点，处在国家垄断阶段上的资本主义。其中，北美、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最为典型，是我们的考察重点。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主要表现在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三个方面。

## 生产力方面的变化

经济加速发展。战后各主要西方国家经济都获得了较快的发展速度，扣除物价上涨因素，1980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比110年前的1870年增长了42倍，同期德国增长了23倍，日本增长了55.5倍。90年代后仍保持了很强的增长势头。

发展的波动性越来越小。现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已经很少有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前经济产值下降近一半那样的大起大落，经济衰退主要是增长型的衰退。

产业结构产生了深刻变化。产业结构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国民经济一、二、三产业所占比重的变化上。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第一产业的比重已不到3%，美国只有2%。

度应控制在不足以左右政府决策的范围之内。此外，我们还需加紧补上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必修课，强

第二产业的比重在不断下降。而第三产业比重一般都在60%以上。

## 生产关系方面的变化

在产权关系上，当代资本主义在坚持私有制不变的前提下，对财产所有形式进行了调整，出现了所谓资本社会化的趋势。资本的社会化是通过两种渠道来实现的。一是根据经济形势的需要建立和发展一定比重的国有经济。从1984年到1993年的10年间，国家在国内总固定资本形成中所占的比重，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家分别保持在12%至23%之间。资本社会化的最主要的形式是企业股权的分散化。在早期的资本主义企业中，资本家既是所有者，又是经营者。而战后情况就不一样了，社会个人购买股票和企业法人之间互相购买股票的越来越多，出现了所谓股权分散化、社会化的趋向。这种趋向既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也是国家政策主动调节的产物。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就大力推行国有股权私有化的运动，这在

化平等竞争、互利双赢的价值观。

（摘自《中国经济时报》）

客观上对股权的分散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股浪潮在 80 年代很快风靡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股权的分散化、社会化意味着资本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传统的资本家开始从生产领域中退出来。新型的经理资本家的人数和作用随之迅速增加，形成了所谓的“专家集团”、“经理阶层”。

在劳资关系上，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在坚持不损害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前提下，采取包括允许部分工人参加企业管理等多种形式改善劳资关系，缓和阶级矛盾。80 年代以来，欧美等国不同程度地推行企业民主管理。如欧共体各国普遍实行共同决定制度。按规定，企业必须吸收一定比例的工人代表进入董事会，否则将属违法行为。如德国企业是监事会领导制，监事会中工人代表约占 1/3。

在分配关系上，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在坚持以剥削为特征的按资分配的前提下对收入分配政策进行调整，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前，收入分配完全是资本家的事，国家没有实质性干预。工人阶级的生活在一个很低的生产力水平上完全依靠由资本家决定的初次分配。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开始通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全面介入个人收入分配。在企业层面的初次分配上，很多国家都积极调和资方与工方的矛盾。同时，国家也加大了国民收入二次分配调

节的力度。在本世纪初，美国政府开支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5%—8% 左右，而现在一般都保持在 35% 左右。目前，西方国家每年通过税收能够集中起来的国民收入一般都在 1/3 以上，其中欧盟国家已接近 50%。在以国家财政形式集中起来的这一部分国民财富中，大约有 60% 要用于贫困救济、免费医疗、失业补贴、养老金发放、教育等社会福利开支。这样，在发达国家的工人和贫困人口的生活费用中，来自财政收入再分配的比重越来越大了。如瑞典工人收入就有 1/3 来自社会福利。

## 上层建筑方面的变化

在坚持资产阶级统治不变的情况下，对上层建筑的若干重要环节进行了调整。这突出地表现在：

第一，实现了政治制度与法制的有效结合。西方政治制度，通常由议会制度、政党制度、选举制度、行政制度和司法制度组成。二战以后，这些制度的运行已经实现了法律化。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宪法和法律，使国家权力的构成、权力结构中各权力主体的关系和活动，官员的任免、提升、奖励和监督等，都纳入法制化的轨道。

第二，国家管理经济和社会的职能大大增强，对经济和社会各领域活动的渗透空前增强，国家开始承担起越来越多的社会公共事务。与此相应，国家在调节社会各阶层

# 船王与儿子

□陆勇强

船王有一个儿子，他是惟一的继承人。船王对儿子的期望很高，希望儿子能掌握驾船技术，开好他置下的这条船。船王的儿子对驾驶技术学得也很用心，到了成年，他驾驶机轮船的知识已十分丰富。船王便很放心让他一个人出海。可是，他的儿子却再也没有回来，还有他的船。

他的儿子死于一次台风，一次对于渔民来说十分微不足道的台风。

船王十分伤心：我真不明白，我的驾船技术这么好，我的儿子怎会这么差劲？我从他懂事起就

教他如何驾船，从最基本的教起，告诉他如何对付海中的暗流，如何识别台风前兆，又如何采取应急措施。凡是我经年积累下来的经验，我都毫不保留地传授给他了。可是，他却在一个很浅的海域内丧了生。

渔民们纷纷安慰他。可是，有位老人却问：“你一直手把手地教他吗？”

“是的，为了让他掌握技术，我教得很仔细。”

“他一直跟着你吗？”

“是的，我儿子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

老人说：“这样说来，你也有过错啊。”船王不解，老人说：“你的过错已经很明显了。你只传授给他技术，却不能传授给他教训。对于知识来说，没有教训作为根基，知识只能是纸上谈兵。”

（摘自《现代青年》）

矛盾方面的作用也越发突出。

第三，资产阶级的民主形式进一步扩大，在消除选举的种族、性别歧视并实现较为完整意义上的普选制的基础上，西方国家公民权利的内涵与外延又有新的拓展，公民权利相应地得到扩大。

第四，意识形态中左翼与右翼的分歧逐渐减弱，资产阶级政党党纲的差别也日趋缩小，主流意识形

态的地位虽然未变，但多元化的价值取向却更加鲜明。

这表明资本主义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已经建立起了比较成熟的政治制度和法制制度。这些制度在实际生活中发挥了协调资产阶级内部关系及其与无产阶级矛盾的作用。

（摘自《学习时报》）

# 50年：中国与世界

□牛 军

50年来中国与世界关系证明 改变自己 对于解决“中国与世界”这个关键性的命题,仍然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与世界”是一个复杂而又十分重大的课题。百多年来,中国人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和回答,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国外交的走向和成败。这一百年课题演化至今,可以基本浓缩为:中国与现存国际体系的关系。

从中国研究界思考的脉络看,“中国与现存国际体系的关系”这一命题的提出,最初是由思考冷战后的中美关系引起的。90年代中美关系的曲折发展表明,影响中美关系的最深层因素,是中国与当今国际体系的关系,这是由冷战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基本特征、中美各自在其中的地位,以及中国所处的历史进程决定的。当然,从对外关系的角度看,中国与现存国际体系的关系远不是中美关系可以涵盖的,尽管它是其中至关重要的部分。

难题依旧,  
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也许正是由于关系越来越密切的同时,又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

和麻烦,中国人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和谈论这一问题。与之相伴而生的诸如“与国际经济接轨”、“参与全球化进程”、“建设性融入”、“做负责任的大国”等等观点,从不同层次和不同角度,反映了中国人在此领域的思考及其达到的深度。迄今为止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人们已经不同程度地达成了某种共识,即中国最终融入现存的国际体系,是不大可能逆转的趋势。

但是,事情并不是如此简单和确定。中国对外政策出现的一些波动实际上表明,在一些关键性问题上,中国人中还没有达成足以使政策保持稳定所必要的共识,也没有居压倒性的主流意见。如:中国与现存国际体系到底是什么关系?中国除了不挑战现存国际体系和争取从与之交往中获利外,是否要予以认同?进一步说,冷战结束后中国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努力要达到何种程度、取得何种成果,它才会明确地表示认同现存的国际体系?等等。

中国人很可能长期难以得出明确的结论,只能继续“摸着石头过

河”。一些学人断言 中国不做现存国际体系的挑战者，却又实在说不出该发挥什么作用，可能是因为说不清楚。关于“平等的一员”的说法毫无疑问是必须坚持的原则，但需要进一步解释和具体化。

## 国际体系与自身道路， 如何选择

“中国与现存国际体系的关系”之所以成为一道难解之题，有内外两方面的原因。外部原因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在现存国际体系中占主导地位，这个体系的主要规则是由它们主导制订的，更符合它们的利益，而且一些规则还在按照它们的愿望修改或调整。特别是美国正到处干预，还不断向中国的一些重大利益挑战。中国目前的多重国家属性（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曾经遭受侵略和压迫的国家、有悠久文明历史的东方国家、正在崛起为强国的非西方国家，等等）决定了不论从哪方面考虑，对上述状况都是难以完全认同的。

内部原因是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在 20 世纪后 50 年的历程中 中国只有在第一个十年里 国家的发展战略、安全战略和外交战略是高度协调的。当时世界上存在着被称为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两大国际体系。新中国选择了苏联模式的发展道路，这决定了它一诞生便主动加入到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国际体系之中。

近年来，历史学家已经达成共识，即刘少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对莫斯科的访问，奠定了新中国与苏联建立战略同盟的基础，斯大林从此决定，接纳中国成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员。

新中国根据苏联的模式建国，与社会主义国际体系全面接轨，包括政治、经济、贸易、教育、国防、外交等等领域 从政策到体制 照搬照学，当然也包括承认苏联在社会主义国际体系中的领导地位。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那十年中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这证明，在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高度协调时 中国的发展速度比较快 外交战略也比较清晰。

导致中苏同盟破裂和中国脱离苏联阵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关键的因素是斯大林去世后，中国不再容忍这个体系中苏联与其他国家那种“父子”式的不平等关系 以及当时中苏对对方的内外政策都有不同的看法。

众所周知，70年代初，主要出于安全战略的需要，中国决定打开对美关系。但是，发展与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与当时中国国内“文革”的极左政策极不协调 这是制约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使谈判长达多年的原因之一。对这一问题的忽视或缺乏研究，使相当多的中国人存在这样一种看法，即只要在战略安全方面有共同利益，就以维系与美国的关系。但事实是，

共同的战略利益只不过促成了中美关系的缓和，而中美关系正常化却是与中国决定改革开放直接联系在一起，在时间上也是同步的。

以中美关系正常化为标志，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安全战略和外交战略，实际上完成了一次历史性的协调，这一过程的出现是以国家发展道路的转变为基础的，它为中国同现存国际体系建立积极的和日益密切的关系，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开拓了广阔的空间，并且使这种关系经受住了苏联解体后中国战略地位变化所造成的严重冲击。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中国要在冷战后与发达国家占主导地位的国际体系维持和发展积极的和建设性的关系会困难得多。

历史的进程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发展道路给中国发展与现存国际体系的关系，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和基本根据，不过这条发展道路在其演变过程中逐步显露出来的某些特点，也构成了中国与现存国际体系融合的内在限度。如果说发达国家在现存国际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决定了中国与现存国际体系发展关系的限度，那么中国发展道路本身的特点，则是中国暂时还难以下决心“融入”其中的内部原因。

改变自己，掌握主动权

正是内外两方面的因素 决定

了中国人在未来一个时期里，仍然难以在中国同现存国际体系的关系这一问题上达成共识。融入现存国际体系这一点即使真的是不可逆转，也要经历一个曲折和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外交战略在内外因素的影响下出现波动甚至挫折，并不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例如当前中国外交面临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之间内在的不协调，即对中国安全的主要压力甚至威胁，恰恰来自中国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必须与之积极交往的对象上，所以对安全威胁的应对难免要冲击到改革开放的许多方面，包括经济（市场经济取向的）地缘政治（东南沿海）和外交（与发达国家的关系）等等。困难就在于当前这种不协调暂时只能通过外交手段和技巧加以调适或缓解，而不再可能像过去那样“大踏步前进”或“大踏步后退”。

一位中国学者说过：“中国往往是通过改变自己来改变世界的。”<sup>50</sup>年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证明，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当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中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掌握着主动权。改变自己——不断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并稳妥地逐步推进与之相适应的法制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 对于解决“中国与世界”这个关键性的命题，仍然是至关重要的。

（摘自《环球时报》）

# 格林斯潘谈美国经济走势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最近承认，美国经济增速正在明显放慢，且面临着“继续下滑的危险”；但他同时认为，美国经济并没有进入全面衰退，而是有可能随着技术和劳动生产率的发展，在今年晚些时候走出“紧缩”的困境。

格林斯潘是在国会参议院每半年举行一次的金融政策听证会上发表上述观点的。他说，去年7月美国经济在经过一年“格外迅速和无法持续的增长”之后，开始出现放慢迹象；去年第四季度，耐用消费品和资本设备投资下降，股票尤其是高科技股票价格下跌，经济增速放慢的现象日见严重，“在去年年底甚至可能出现了停顿状况”。

格林斯潘对最近美联储为刺激经济而连续降息的行为作了解释。他说：“美联储作出这一反应的一个先决条件是使成本和价格压力继续得到控制，因此我们采取的行动不可能破坏稳定的、低通货膨胀的环境，而这种环境对于促进投资和提高生产力十分重要。”

格林斯潘认为，去年年底公布的许多经济指数显示美国经济增长十分微弱，“但这种情况到今年1月份已不再继续”。他估计，美国今年四个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可能在2%至2.5% 失业率可能达到

4.5% 通货膨胀率可能在1.75%到2.25%。

格林斯潘认为，美国经济放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供给的增速超过了需求的增速。他说 尽管高科技产品的社会需求以每年两至三倍的速度增长 但在许多情况下 新产品的供给量增长得更快。这些产业发展到某一时期便会出现暂时性市场饱和。因此 要想实现经济的平衡和可持续增长，消费和投资速度适当放慢是“必要的 也是可以预料到的”。

格林斯潘认为，能源价格上升导致成本增加，是造成美国经济放缓的另一个原因。此外，股票市场的降温使家庭财富大大减少，进而对消费心理造成了影响，这也是导致经济放缓的原因之一。

格林斯潘在剖析了当前经济问题的同时，仍然对美国经济发展前景表示乐观。他说，虽然从近期来看 美国经济可能会继续疲软 但是美联储的委员和银行总裁们都相信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今年晚些时候将会出现促进经济发展的“更加强劲有力的条件”。

格林斯潘说，技术变化和劳动生产率在决定近期经济周期和经济持续发展的过程中有重要作用，这是预测未来经济形势和了解目前政策的关键。他表示相信“在今后数